

## 小议《四书章句集注》

李致忠

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,从其产生起,影响中国几百年。直到今天,在国学热的气氛中仍在产生影响。介绍、阐释它的专著、文章也层出不穷。下面仅就个人所知,也谈一点有关四书及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方面的话题。

### 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出现前的四书情况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《春秋》类后、《孝经》类前著录《论语》十二家,二百二十九篇。其中纯粹属于《论语》者,有《古论语》二十一篇;《齐论》二十一篇;《鲁论》二十篇;《传》十九篇;《齐说》二十九篇;《鲁夏侯说》二十一篇;《鲁安昌说》二十一篇;《鲁王骏说》二十篇;《燕传说》三卷。表明西汉时不但有《论语》在流传,而且有多家传注,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。

到《隋书·经籍志》,则将《孝经》与《论语》在部居上颠倒了位置,使《孝经》居前,《论语》居后,表明此时人们对《孝经》与《论语》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,并著录各种注解的《论语》二十六种。其后由唐至清,在《论语》这部书上下工夫并形成专著者,不计其数。就是朱熹本人,在正式为《论语》作集注之前,于隆兴元年(1163)先作成了《论语要义》,接着又作成《论语训蒙口义》。乾道八年(1172)又进一步加工,作成《论语精义》,最后才为《论语》作集注。此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出现前《论语》的简单情况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类著录《孟子》十一篇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在儒家类著录赵岐注《孟子》十四卷;郑玄注《孟子》七卷;刘熙注《孟子》七卷。《新书·艺文志》著录同《隋志》。到《宋史·艺文志》,又增添著录陆善经《孟子注》七卷;王雱注《孟子》十四卷;蒋之奇《孟子解》六卷。朱熹本人在为《孟子》作集注之前,也是先作了《孟子精义》,后又改名《孟子集义》,最后才作《孟子集注》。此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出现前《孟子》的简单情况。

《大学》一书,前举的史志目录虽不见著录,但到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则著录司马光《大学广义》一卷、《中庸广义》一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还著录了吕大临《大学》一卷。表明早在朱熹之前已有人将《大学》从《礼记》中摘出加以诠释并单独行世了。

至若《中庸》，则早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就著录有《中庸说》二篇。至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则著录南朝宋散骑常侍戴颙撰的《礼记中庸传》二卷；梁武帝撰《中庸讲疏》一卷；另有《私记制旨中庸义》五卷。至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著录有胡先生《中庸义》一卷；程颢《中庸义》一卷；吕大临《中庸》一卷；乔执中《中庸义》一卷；游酢《中庸解义》五卷；郭忠孝《中庸说》一卷。这些著作大概都早于朱熹为《中庸》作章句。可见，简单说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原是《礼记》中的篇章，至宋代时被单独抽出，朱熹对二书加以注释，是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。历史事实是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早在《礼记》产生之前久已行世，到西汉时被戴圣收入小戴《礼记》，才成为《礼记》中的篇章。朱熹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作章句时，其原文是不是一定从《礼记》中摘出，已很难判断。退一步讲，即便真是宋朝人将这两篇从《礼记》中摘出，最早的也不是朱熹。清人毛奇龄《经问》卷三载：“宋仁宗于戴《记》中表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篇，以赐王尧臣、吕臻，遂开一代理学之始。”可见从《礼记》中表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并命人加以训释而单行者，是北宋仁宗。朱熹为这两篇作章句，不过是北宋以来对这两篇著作格外加以重视的继续和发扬。

#### 朱熹为什么要为《四书》作章句集注

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修改《四书集注》，是为了贯彻他的“道统”思想，其实也未必有这么严重。朱熹长孙朱鉴编撰的《朱文公易说》卷十八，记载有人问朱熹怎么看《周易》，朱熹答云：“未好看，《易》自难看”。并说“《易》本因卜筮而设，推原阴阳消长之理，吉凶悔吝之道，先儒讲解失圣人意处多，待用心力去求是，费多少时光！不如且先读《论语》等书。某枉费多年工夫，近来于《诗》、《易》略得圣人之意。今学者不如且看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四书，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，自应有得。”同卷又载朱氏尝说：“人自有合读底书，如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等书，岂可不读！读此四书，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，与其为学之次序，然后更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。某才见说看《易》便知他错了，未尝识那为学之序。”清人程川所编的《朱子五经语类》卷二也记载了类似的说法，并引证朱熹的话说“《易》自是别是一个道理，不是教人底书”。朱熹还在自己的《晦庵集》卷八十二《书临漳所刻四子后》中说：“自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，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，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，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旨要归也哉！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，必先使之用力乎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之书，然后及乎六经，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。”可见朱熹之所以强调要先读这四种书，没有什么更深奥的意思，只是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更符合由浅入深、循序渐进的治经道理。

上述这些记载反映了朱熹的两个读经主张：一是他认为《周易》的性质，乃卜筮之书，是用来“推原阴阳消长之理”和“吉凶悔吝之道”的高深著作，开

始就读它,“未易”,“未好看”。不如先读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这四种书。原因是“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既治,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”<sup>①</sup>。表明他认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反映了《六经》的精神要旨,若真能读懂读通,则《六经》可不治而自明。这显然是要为士子们找出一条读经的门径。二是朱熹认为《大学》,乃孔氏之遗书,“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”又说:“古之《大学》,所以教人之法也。……人生八岁,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,皆入小学,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,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文;及其十有五年,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,以至于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,皆入大学,而教之穷理正心,修己治人之道。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。”<sup>②</sup>又说“《大学》是圣门最初用功之处,格物又是大学最初用工之处。试考其说,就日用间如此作功夫,久之,意思自别,见得世间一切利欲好乐皆不足以动心,便是小小见效处也。”<sup>③</sup>足见朱熹之所以要为《大学》作章句,完全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“初学入德之门”,以及循序渐进的读书方法。

朱熹又说:“不偏之谓中,不易之谓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,庸者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。”<sup>④</sup>。足见朱熹之所以要为《中庸》作章句,完全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接受孔门心法的传授途径。众所周知,朱熹不仅是经学家、理学家,更是教育家。教育家的职责,就是要使广博渊深的儒家经典与儒家思想传承下去。要传承,就要学习,就要教授。要教授,要学习,就要有教授的方法和学习的途径。所以他说《易》“不是教人的书”。而《大学》才是“初学入德之门”,《中庸》才是“孔门传授心法”的捷径。这恐怕是朱熹以毕生精力撰著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主要原因。这是教育家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。至于在为四书作章句集注的过程中要贯彻他的“道统”和“理学”思想,这是必然的,是无须讨论而自然可知的逻辑。

### 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编排次序

“百度”网站上转发的署名张秀平、王晓明《影响中国的100本书》说:“《四书集注》的编排次序,也颇具深意。将《大学》排在首位,《中庸》次之,而后才是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在朱熹看来,《大学》是‘初学入德之门’,初学者应先学《大学》,然后再学其他。《大学章句》内容丰富,有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等‘八条目’,是理学之伦理、政治、哲学的基本纲领,包含了理学之主要内容,所以朱熹特别看重它。《中庸》是‘孔门传授心法’的重要著作,是儒家相传的思想原则。《中庸》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,

①《四书章句集注·读〈论语〉〈孟子〉法》。

②《四书章句集注·大学章句序说》。

③《晦庵集》卷五十八《答宋深之》。

④《四书章句集注·中庸章句序说》。

《中庸》所提出的‘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’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，亦为朱熹所推重。”好像四书的编排次序早在朱熹时就已经排定，并且“颇具深意”。其实，也未必有这么复杂。

前引《朱文公易说》卷十八，记载朱子两次谈到读四书时，都是说“今学者不如且看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四书，且就见成道理，精心细求，自应有得。”又说：“人自有合读底书，如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等书，岂可不读！”到《晦庵集》卷八十二《书临漳所刊四子》中又说：“河南程夫子之教人，必先使之用力乎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之书，然后及乎六经。”虽然将《中庸》调到了《孟子》之前，但仍不是后来所说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这种次序。朱熹的这些说法和排法，是真的具有深意还是随便说的，不敢主观臆测。但若真有深意，则怎么也不会把《中庸》放在四书的最后，也不会简单地将《中庸》调至《孟子》之前就算了事；若无深意，那就是朱熹在回答问题时随意说出的次序，未必认真思考过这四种书到底谁该在前谁该在后。

朱熹在《大学章句序》中引证程子话说：“大学之书，孔氏之遗书”。在《中庸章句序》中说：“《中庸》何为而作也，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”。在《论语集注序说》中说：“孔子生鲤，字伯鱼，先卒。伯鱼生伋，字子思，作《中庸》”。又引证程子话说：“《论语》之书成于有子，曾子之门人”。而在《孟子集注序说》中又说：“孟轲师子思，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”。可见朱熹对孔子、曾子、有子、子思、孟子等人的师承授受关系是十分清楚的，可他为什么置这种关系于不顾，硬是两次说出上述那种次序呢？原因可能跟当时集注章句这四种书的成书时间不一和出版形态有关。

朱熹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作集注，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作章句，并不是完成在同一个时间。南宋孝宗淳熙四年（1177）朱熹完成了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集注；十二年后，也就是在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才又完成对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章句任务。史载他在完成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章句的第二年，即南宋光宗绍熙元年（1190），就到福建漳州去做官，其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就在当地付梓了，这大概是这四种书开雕的第一个版本，只可惜这个版本久已失传，究竟是四种书同时付梓，还是只刻了其中某两种，今已无法言其究竟。不过从现存最早的宋版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看，漳州本大概仍然应该是四种书各有起迄、可以各自单行的状态。

现存最早刻本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是宋嘉定十年（1217）当塗郡斋刻嘉熙四年（1240）淳祐八年（1248）十二年（1252）递修的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《序说》一卷；《孟子集注》十四卷《序说》一卷，可见这两种早完成的书便也就早被付梓开雕了。而出版的形态，是各有起迄，并可以各自单行。待到淳熙十六年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章句完成后，当塗郡斋于淳祐十二年刻梓时，卷端上题仍是“大学”、“中庸”；而下题则分别是“朱熹章句”。仍是各有起迄，并可各自单

行。这种刻不一时又能各自单行的出版形态,还有什么编次可言!所以朱熹在谈到这四种书时,并未过多注意它们的排次。后来之所以出现排次上的考论,盖有两大原因:一是出版者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篇叶无多,規制较小,印成后将两书并为一册装订,遂移《中庸》于《论语》之前,因而形成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次序。这纯粹是技术问题,谈不到什么“深意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四书章句集注》提要说四书“原本首《大学》,次《论语》,次《孟子》,次《中庸》,后刊本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篇页无多,并为一册,遂移《中庸》于《论语》前。”证实了这一点。二是到了明代,《四书集注》不但成了士子必读之书,也成了国家科举考试命题和阅取的解释标准。既然官方如此看重四书,所以就想提高它的严肃性,因此又以四书之成书早晚重新加以排列。《大学》以是孔子遗书或曾子述作的原因,故排在最前边;《中庸》是子思的作品,子思是曾子的弟子,孟子的老师,当然既不能排在《大学》之前,也不能排在《孟子》之后,所以也就移到了《论语》的前边,因而也形成了与出版家相同的排列顺序。《四库全书·四书章句集注》提要还称“明代科举命题,又以作者先后,移《中庸》于《孟子》前。然非宏旨所关,不必定复其旧也。”面对如此的事实,一定还要说《四书》的排列顺序颇具什么“深意”,恐怕就难免穿凿附会了。

#### 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现存最早的版本及其书名

前边说过了,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现存最早的刻本,是宋嘉定十年(1217)吴柔胜当塗郡斋刻嘉熙四年(1240)淳祐八年(1248)十二年(1252)递修的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《序说》一卷,《孟子集注》十四卷《序说》一卷;淳祐十二年(1252)金华马光祖当塗郡斋刻的《大学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各一卷。这四种书今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《大学章句》后镌有淳祐十二年(1252)壬子金华马光祖的刻书跋,称:“当塗旧有文公《语》、《孟》集注,注与本文皆大字,于老眼为宜,盖正肃吴公所刊,见谓善本。”这里的“正肃吴公”指的应当就是吴柔胜。

《宋史》卷四百《吴柔胜传》谓“吴柔胜,字胜之,宣州(今安徽宣州市)人。幼听其父讲伊洛书,已知有持敬之学”。又说他“不妄言笑,长游郡泮,人皆惮其方严。登淳熙八年进士第,调都昌簿。丞相赵汝愚知其贤,差嘉兴府学教授。将置之馆阁,会汝愚去,御史汤昉劾柔胜尝救荒浙右,擅放田租,为汝愚收人心。且主朱熹之学,不可为师儒官。自是闲居十馀年。嘉定初,主管刑、工部架阁文字,迁国子正,柔胜始以朱熹四书与诸生诵习,讲义策问皆以是为先”。可见在学术思想上吴柔胜与朱熹是相通的,或者说是朱熹理学的自愿传播者,这是他后来在当塗郡斋主刻《语》、《孟》集注的思想基础。

考康熙《太平府志》,在《名宦传》中记载“吴柔胜嘉定十年以朝奉郎知太平州,次年,转朝散郎直文华阁。谥正肃。”表明嘉定十年(1217)吴柔胜确曾在太平州做过官。而太平州的治所就在当塗(今属安徽)。这使吴柔胜有了刻书的权力与机会,于是在知太平州的当年,即主持刻印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的

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集注,故此两书之版本确应著录为“宋嘉定十年吴柔胜当塗郡斋刻本”。表明这时他对朱熹的四书已不仅仅满足于先前的教习诸生,而是将朱熹四书中的《语》、《孟》集注上版梓行,进一步加大了宣传力度,借以扩大它的影响。淳祐十二年马光祖刻书跋还称:“光祖应竭来攸守,依仿规制,取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章句并刊之,足成《四书》。《语》、《孟》岁月浸久,间有漫灭,就加整治。是书在天地间无穷达,老少皆不可一日废。熟读玩味,则施之行事,其有不敬且畏哉!淳祐壬子孟秋朔旦,金华马光祖敬识。”表明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是在两个不同时段里先后刻成的。第一个时段,是嘉定十年吴柔胜官太平州时,首先将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《序说》一卷、《孟子集注》十四卷《序说》一卷刻于当塗郡斋。第二个时段,是三十五年后的淳祐十二年(1252),金华马光祖来守太平州时,又依仿当年吴柔胜刻《语》、《孟》集注时的版式规制,刻了《大学章句》和《中庸章句》。与此同时,马氏还取用吴刻《语》、《孟》集注旧版加以修补整治,与新刻《大学章句》和《中庸章句》同时印刷,终将四书归于一体,故其版式字体、印纸墨色浑然天成,若是不知道上述刻版修补经过,实难加以区分。

关于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这个名称,本书并没有这么个总冠名,也不见宋代书目著录。如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題》,著录有朱熹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、《孟子集注》十四卷;又著录有朱熹的《大学章句》一卷《或问》二卷、《中庸章句》一卷《或问》二卷,而绝无《四书集注》或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著录。《宋史》卷四〇一《刘燾传》,载他曾为朱熹伪学之案“乞罢伪学之诏,息邪说,正人心”;“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,取熹《四书集注》刊行之”。这是《四书集注》之名出现的较早记载,但也只是口头之说或行文用语,尚不是严格的目录著录。清乾隆重修《江南通志》卷一百六十七记载祝穆之子祝洙尝撰《四书集注附录》,且由宰执将其书进呈,从而授赠太学博士之事。本《通志》卷一百九十艺文志亦同时予以著录。其后的《千顷堂书目》、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亦相继加以著录。这些著录虽有《四书集注》之名,但它是在朱熹四书基础上又衍绎出来的新书,尚不是目录专书单独著录的《四书集注》。

《元史》卷一百八十九《许谦传》,谓许谦尝“读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有《丛说》二十卷。”这是较早出现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之名。《日知录》卷十四谓“以今论之,惟程子之《易传》、朱子之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易本义》、《诗传》及蔡氏之《尚书集传》、胡氏之《春秋传》、陈氏之《礼记集说》,是所谓代用其书,垂于国胄者尔。”也是较早出现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之名。但这些仍然是在行文中出现的书名,尚不属书目正规的著录之名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收录并著录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书名虽袭用了历史上的贯称,但其所录之书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卷端上题仍是只题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,下题则分别是“宋朱子章句”。而《语》、《孟》两书卷端上题仍是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卷几,下题则仍是“宋朱子集注”。真正以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名在目录著作中加以正规著录究竟始于哪

部书目,虽一时难以说清,但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此书的来源可知,最晚大概不会晚于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。国图此本原是铁琴铜剑楼的插架之物,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六著录了此书,其名即是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并说“是本为诸家所未见,故并无题识及收藏印记,而间有妄加涂改之处,然楮墨完好,字大悦目,真宋刊之上品也。”可知此本在进瞿氏铁琴铜剑楼之前未见其他著录,因而推测最早以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题名著录此书者,即是铁琴铜剑楼。前边曾经说过,嘉定十年吴柔胜当塗郡斋刻本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其卷端上题分别是“论语卷第xx”,“孟子卷第xx”;而卷端下题则分别是“朱熹集注”。淳祐十二年马光祖当塗郡斋刻本的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,其卷端上题是“大学”和“中庸”,而卷端下题则分别是“朱熹章句”。这里的“集注”与“章句”,分明都指的是著作方式。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简约为“四书”,再将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所作“章句”,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所作“集注”拼合成“章句集注”,再与“四书”合并而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这实在是一种不合著录规则的操弄。但历史就这么延续下来了,人们并没有觉得什么不自然。历史上不只是此书如此,还有其他一些亦如此。如唐李鼎祚的《周易集解》,原书卷端上题仅是“周易”,下题则是“集解”,可是古人为了以一语给人以完整、准确的内容概念,便硬是将著作方式一并题作书名。

所谓“集注”,意即集众人之注释;所谓“章句”,则是以训解章句的方法来完成解经的目的。“章句”原是章节与句子的合称,《文心雕龙·章句篇》谓“夫人之立言,因字而生句,积句而成章,积章而成篇。”可见章是文章的段落,句是文章中最基本的语义构成成分。根据文章中每句每段的内在含义加以铨释,就称为章句之学。在汉代,由于注家多用分章析句的方式来解说古书,于是便形成一种流行的著作体。朱熹注解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时就采用了这种方式。后人将著作方式放在书名里另立名称,绝非朱熹的原意,编目者也不应该如此的改头换面,造成混乱,给人们造成好像宋代就有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之名的假象。不过,瞿鏞编制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之前久已有此说法,他袭来作为书名正规加以著录,我们今人也无须过多指责。因为早在清咸丰七年(1857)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就已编完,并请宋翔凤为之写序。那么早的书目,绝没有今天编目著录的严格要求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